
“穿透”人生的幻象

——论鲁迅作品中的上海想象

张玲^{*1}

【摘要】：鲁迅的思想深度和文化视境决定了他所阐释的上海都市不同于其他作家的上海书写。上海作为文学建构的一种形象，并不是鲁迅对现实上海文化景观的简单描摹和反映，而是作者基于艺术理念与现实社会思考，通过创造性的虚构文本将艺术真实层面的上海想象加以表达。在他的作品中，鲁迅并没有直观地去描绘这个极具审美现代性的“魔幻之都”，而是以强烈的怀疑、批判的精神和眼光，冷静地审视着上海的一切，并将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融入到上海镜像的描写中，以此对上海都市作出更深层的文化探究和社会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穿透”了人生的幻象，恢复了现实的“痛感”，以国家叙述代替上海叙述，将上海问题国家化，形成了带有鲁迅特有“气质”的上海想象。“上海经验”的获得既丰富了鲁迅作品的创作内涵，同时作为1930年代“上海想象”的一种，为后人审视上海以及上海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鲁迅；上海；政治；文化；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2-0173-12

“一个城市不仅仅是一块地方，而且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1]1930年代的上海给人的感受纷繁复杂，是京派作家笔下的恶俗之地、势力之区，也是海派作家作品中的十里洋场、东方巴黎，因创作主体的不同呈现出了不同的城市景观，文学上海的想象地图也随之被不停地涂改着、变形着。正如赵园所说：“文学的上海就是这样支离破碎，无从整合。不同作家笔下的北京是同一个，连空气也是一整块的，不同作家笔下的上海却俨若不同世界以及不同世纪。即使在同一位作者那里，上海也会破碎、割裂。”^[2]鲁迅的思想深度和文化视境决定了他所阐释的上海都市既不同于京派、海派作家笔下的上海，也有别于同时期其他左翼作家作品中所呈现的上海。上海，作为一个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的标志，在鲁迅的文学书写中，既负载着真实的物理空间，同时又是文学建构的一种形象，这一形象并不是鲁迅对现实上海日常城市文化景观的简单描摹和反映，而是作者基于艺术理念与现实社会思考，通过创造性的虚构文本将艺术真实层面的上海想象加以表达。在鲁迅的作品中，他并没有直观地去描绘这个极具审美现代性的“魔幻之都”，而是从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层面去描述和想象上海，并将自己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融入到上海镜像的描写中，以批评和反抗为立场创生着有别于“旧我”又不同于“他者”的文学上海。

鲁迅的最后十年(1927—1936)是在上海度过的，但他与上海之间特殊的相互生成关系目前并没有引起研究者们更多的重视。这十年是鲁迅创作和思想成熟的历史时期，也是鲁迅“上海经验”的获得和写作时期。上海期间，鲁迅的文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忆性的文字转而变为对现实的关注，他从实地观察和切身感受出发，以犀利之笔，攻击一切黑暗势力，其杂文世界与上海生活经验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关系，并对上海都市的方方面面作出了相应的即时性回应，这既是上海经验的一次独特呈现，更是1930年代上海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下的特殊产物。作为一名睿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上海这座城市都市化、现代化背后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以及以海派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穿透”了人生的幻象，恢复了现实的“痛感”。生活在“五方杂处”的上海，鲁迅“并没有为上海所限，把自己缩小为一个‘上海作家’。鲁迅从来没有把上海与整个中国分开，上海只是鲁迅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3]。正如钱理群所总结的那样，鲁迅的文章是“对以上海为中

¹ 收稿日期：2017-09-11

作者简介：张玲，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江西 南昌 330063）

心的 30 年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商业社会的透视与批判”^[4]。鲁迅以独立不倚的精神姿态对上海这座城市始终保持着冷静的观察和深刻的剖析，在对上海更深层的文化探究和社会思考中，以国家叙述代替上海叙述，形成了带有鲁迅特有“气质”的上海想象。

“五四”以后，虽然传统思想和文化陈规遭到强烈批判，但 1930 年代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传统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当上海以极度物质化的现代氛围让人们陶醉其中时，鲁迅以其惯有的冷静目光打量着这城市的一切，他感受到的不只是大都会中所呈现的“摩登”和“时尚”的现代元素，更多的是对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影响及变化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的关注与思考。在鲁迅早年成长期间，他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和留学时的西方民主思想，所以“鲁迅与五四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不同，他的人生记忆始终无法摆脱以前的教育和思想影响，一旦遇到与此相抵触的新思想、新思潮，包括形形色色的党文化，他总会与过去的经验对照一番。这种复杂的记忆底色，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也是最为精彩的”^[5]。作为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作品与时代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张感，在对民族性格和传统文化复杂性的深入思考中，他深切地体会到“愚民的发生，是愚民政策的结果”^[6]，相比较前期，鲁迅 1927 年抵达上海之后，“批判的重心从国民性转移到政治体制”^[7]。

“如果说中国社会从近代到现代的巨大转变，社会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从无党到有党的过程，那么鲁迅先生所生活的整个社会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经历了从无党社会到国民党统治的党治社会。”^[8]上海十年基本上是鲁迅与国民党统治斗争的十年，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停止过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坚定而激烈的批判与斗争。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上海便成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心区域，迁至上海的鲁迅，面对的是更加严峻的社会现实。对于“四·一二”，鲁迅声称自己“被血吓得目瞪口呆”^[9]，从而逃离广州的，然而上海的形势更加恶劣：“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10]权势者“游戏”般的杀人政策让鲁迅极为震惊，他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写在深夜里》等多篇文章中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流氓性、虚伪性以及妥协媚外的奴性本质。国民政府在上海进行着最惨绝人寰的独裁统治，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多次肆意挑衅以及对中国的狂妄滥炸，采取妥协的不抵抗政策；相反，对进步文艺打压却极其严重和残酷：许多作家相继遭到国民党的通缉、枪杀，还常有影片公司和书店遭到袭击，店主或经理被逮捕，书籍被烧毁。大屠杀之外，更有“暗暗的死”：“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除以死刑。”^[11]柔石、胡也频等五个青年作家白白成为反动政府示威的牺牲品，而此事当时“上海的一切中文和西文的报章上，绝无记载”^[12]。因为“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13]；更因为“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血是流的太多了”^[14]。因此在上海，即使“一·二八事变”，也依然是“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在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15]。一面歌舞升平，一面人心惶惶。三十年代的上海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实则暗流汹涌，处处流布着黑暗、恐惧和死亡的阴影。在鲁迅的都市叙事中，随意杀人、文章禁刊、自由限制等词为我们勾画了 1930 年代的另一上海图景，这样的上海不是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繁华、喧嚣、声色犬马的名利场，也不同于张爱玲所书写的琐细平凡、日常浮世的悲欢地。鲁迅悲愤有力地控诉了反动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并将上海问题国家化，指出并批判以上海都市为代表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16]

除了“武力征伐”，更有“文力征伐”。为遏制革命进步文艺的发展，国民党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文，并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机构，实行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1920 年代以后，全国的出版业主要集中在上海，这样的文化专制政策使得上海成为严重的受害之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记载：“沪市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央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相关出版机构也一应被查封，有上海现代书局、北新书店、良友图书公司等，震惊了上海书业界。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中，鲁迅记录了不少当局“封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的事例，其凶残程度，鲁迅说，“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17]。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除胡说八道的官办东西和帮闲凑趣的‘文学’杂志而外，较好(的)都要压迫得奄奄无生气的”^[18]，反而是那些没有反抗意识、失掉骨气的“奴隶文章”横行。对此，鲁迅怒言：“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19]上海“文禁如毛，缁骑遍地”，鲁迅不仅行止颇不自由，文章发表更是异常艰难，“不论新旧，全

在禁止之列”^[20]。既使偶尔发表的文章也是被当局胡乱删改一通，弄的不成样子，不得已，鲁迅不断变换笔名。除却鲁迅，众多的进步青年作家在国民当局的变态打压下更是举步维艰。鲁迅无奈感慨，“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21]。

鲁迅曾言：“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22]，这种侍主子文化一方面是反动政府进行愚民统治、培养奴隶的重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迎合了殖民主义统治中国的需要，成为殖民主义在上海欺压国人的帮凶。在提到租界文化时，我们一般强调的是它的西方化及现代性的一面，而在鲁迅的作品中，通过对殖民主义政治背景下中国民众的生存状态的观察，更多感受到的是来自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歧视与殖民同化，外国殖民者利用国民政府的奴性统治来维护自己的主奴秩序。在鲁迅看来，“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中国，苦人会多起来。”^[23]在上海，处于最下等的是中国社会底层人民，最中心地位的反而是外国殖民者。居住于租界中的鲁迅，通过亲身体验租界文化和殖民统治，批露了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横行和对中国民众生命的轻贱：“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24]黄药眠在自传中也证实，在上海的马路上那些“抄靶子”不仅随意搜查他，还嚣张跋扈不知廉耻的发问：“你什么时候到大英帝国来的？”甚至“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以前，公园门口还挂有‘华人与狗不准进内’的牌子”，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街头横行霸道，对中国人民任意欺辱，而这种民族歧视与压迫，“在广州、汕头还是看不到的”^[25]④。这是1930年代上海特有的街头小景，是上海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的一个突出表现。鲁迅在《推》《踢》《冲》等文章中对殖民侵略者任意践踏国民的恶劣行径进行了更加直观的体验表述，作为殖民者文化行为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这些人在上海的路上“一路推过去”，“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上或肩膀上”；“‘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26]；比起“推”和“踢”，“冲”就更加横暴了，“‘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27]让鲁迅更为愤懑和心痛的是，这些“洋大人”在上海的街头横行之时，我们“忍辱负重”的民众对于这些外国殖民者的无耻之为，却毫无痛觉、无反抗之意，“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28]。这无疑在上海殖民世界中造就了无数的“奴隶”，他们“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一方面欺压人民，另一方面则乞怜于帝国主义的垂青，成为殖民者暴力中国的帮凶。

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中直言：“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从帝国主义的眼睛看来，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29]监狱的看守更是殖民语境下典型的奴才，对被抓进监狱的革命者，进行各种教训，因为“打倒帝国主义就是打破他的饭碗，他要教训我们经过这场监牢生活，折磨折磨，出去以后就会规规矩矩地好好地让他安安心心地吃这份洋饭”^[30]。为了那一点点犒赏，这些人“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31]。愤怒与失望在鲁迅对上海观察与体验中清晰呈现出来，日本友人增田涉曾注意到，在鲁迅的著作和他的日常谈话里，常常出现“奴隶”这个词。他认为，对于鲁迅，这不是“单纯的语言概念”，而是“直接触到内心的”现实，而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32]，是对人的被奴化状态的反思以及对人的自由独立精神的渴望。这样的“现实”不仅仅是鲁迅对上海的一个叙述和思考，更多的则是对自己民族的奴隶地位的自觉的反思，是对“人”的思考，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觉性和警惕性。鲁迅对上海殖民空间的描写和批判，“不仅有其意识形态上的立场与出发点，而且也适时地顺应了上海城市化的进程”^[33]。上海殖民都市所拥有的城市景观和文化景观激发鲁迅对所处文化空间做出怀疑和深切思考，在对西方殖民行为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深入挖掘民众的生存状态，理性反思上海都市的现代化进程。

二

如果说社会政治体制是鲁迅在上海期间关注的重点之一，另一个则是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对社会文化的批判。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到现代文化范围，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文化体制，是鲁迅自始至终思考的重要问

题。2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政局动荡，北京优势顿失，上海以其发达的商业、繁荣的出版业以及相对正规的经济体制、多元的政治和文化空间，吸引着各地文人陆续“漂聚”上海，成为了新文学市场和消费群体的集中地。据悉“1934年，上海出版各种性质的杂志300余种，四开、八开的小报也有几十种，再加上《申报》《新闻报》《时报》《民报》《晨报》等大报，共同撑起了上海的报纸杂志的繁盛局面。”^[34]相对于别处，自然上海有着更大的生存想象空间。鲁迅在广州为未来去向反复思考时，便提到先到上海，想通过“翻译点东西卖卖”来“寻一点饭”^[35]，但“政、教两界”，不想再涉足。弃政、教两届，选择商界，意味着鲁迅“最终从学院走向了文学市场”^[36]，脱离于政体机构，根据自己的意志写作，而这也恰恰体现了鲁迅独立坚定的文学精神。“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的窗口，中西文化首先在这里碰面、会叙，所以近代中国的新学许多是在这里孕育，再由这里扩散。”^[37]西方文化的引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商业文化的建立形成了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同时“上海租界的空气使人自由，适于作家纵笔驰骋；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文学场和社会场的中心，就能够使个人的生命能量自由释放”^[38]。在这个真正具有世界性视野的城市，尽管鲁迅过的并不顺心，“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39]，时常抱怨“上海秽区”，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地方“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40]；但另一方面，随着文人聚集，各种思想也在此发声，沪上文界，如政界一样，鱼龙混杂，其中虽不乏许多优秀者，但文坛上的鬼魅亦不在少数，共同构成了丰富而复杂的上海文化生态。“对城市形象的认识，建立在人与城市之间的心理联系上，具有客观和主观的双重性。”^[41]鲁迅对上海及上海文化的态度也蕴含着双重的张力，上海活跃的文化氛围虽令鲁迅欣喜，但过于杂乱的环境也给他带来“不能静，殊苦”^[42]的烦躁。这份“苦”不仅因所居住环境的吵闹，更多的是指一种抽象意义上的上海文化生活的整体氛围给他的内心所带来的无奈与苦楚，是一份对上海都市文化殖民化、商业化、世俗化的厌恶之情。因此，鲁迅笔下的上海，既直指物质意义上的生存空间，更隐喻了文化意义上的心理空间。

鲁迅在上海期间所作的各类演讲与杂文，其主要批判对象除了政党体制之外，另一个主要就是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各类“帮忙”和“帮闲”。1933年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了文坛上的京海之战，鲁迅则对京海两派都作出批评：“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43]之后鲁迅在《“京派”和“海派”》《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等文章中，对1930年代文坛现状作出进一步分析，针对知识分子之间的种种不良习性以及尔虞我诈，专门撰写了七篇题为“文人相轻”的文章，从多方面勾勒了知识分子复杂心态，对其种种市侩式的行为作出犀利批判，在历史小说《起死》中鲁迅更是直接揭穿了帮闲文人们所宣扬的“无是非观”的欺骗性。鲁迅愤然：“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44]近代文明使一切都商业化，在中国其他地方还不明显，可是在当时国内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却是十分明显了，文人们纷纷利用上海的市场机制和文化环境，卖文为生，“名利气”极重。在商业利益的左右下，“作家不过是一个商店的雇员，作品等于一种货物”^[45]，他们“为了获得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功夫去认真创作了”^[46]，那些作家们“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时间搁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47]。各大出版社也“大抵是营利第一”^[48]，大力推广教科书、童话书以及各类消遣娱乐等满足市场需求的书刊。那些留居上海的作家们主动或被动地炒作作品，为了几文稿费，不惜采用“剪贴，瞎抄，贩卖，假冒”等种种手段欺骗读者，从而在上海的文坛中迅速滋生出一大群“无文”的文人、“捐班”学者、“商定”文豪，上海文坛功利而浮躁。鲁迅在《文坛三户》《商贾的批评》《大小骗》《商定文豪》等系列文章中，一再指出上海文坛严重的商业化现象。在此情形下，上海文坛看似热闹，实则很难有好的作品面世，“现在上海虽然还出版着一大堆的所谓文艺杂志，其实却等于空虚”^[49]。十里洋场的文化形态让鲁迅担忧不已：“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50]

1930年代上海文坛还有两种人很特别：一种是“胡闹”文人，一种是“青皮”作家。“胡闹”文人们“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由于上海文坛原本就矛盾重重，加之文人们的“胡闹”，致使上海文坛冲突不断，知识分子集团处于不断的分裂与重组中。所谓“青皮”作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51]。为此，鲁迅不仅多次提醒初到上海的萧红、萧军要警惕文坛上的鬼魅魍魉，小心行事；而且还奉劝徐懋庸等青年作家们不要将时光浪费在这些莫名其妙的论战之中。鲁迅后期的杂文基本上概括了1930年代上海文化的各个方面，如《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上

海所感》《“京派”和“海派”》等，鲁迅在一种宏观的视野下，大胆指陈上海文坛环境的恶劣以及各种弊病：“我与中国新人文相周旋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居多，漂聚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52]文坛污浊，叭儿无穷，鲁迅愤然：“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53]面对文化劣败下的生命本相，鲁迅始终以理性的姿态坚持着反抗，他相信“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54]，这也是鲁迅最终没有离开上海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各种力量的汇聚地，也是鲁迅对各种反动势力和文化劣相作出努力抗战的最理想场所，只有在上海，他才能对敌人作出最强有力的反击。所以友人虽多次劝离上海，鲁迅始终坚持着一种偏不离去、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姿态：“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若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加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经逃到青岛，我更非住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55]即使到了生命后期，他也依然毫无退缩之意，“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56]。“永远的批判者”鲁迅“在‘一党专治’的独裁政体的压迫下，以他的强韧持久而卓有成效的反抗，成为现代中国的‘不满的文化’的一个永久性的象征。”^[57]

上海期间，鲁迅不断陷入各种纷争和威胁之中，除了时时警惕着来自政界的迫害与暗杀，“威胁的另一来源是一些小报和文学刊物，上面有由一些自称作家的‘坏人’炮制出来的各种谣言。这些人有的可能是国民党雇佣的，有的是当年的左翼现已‘转向’者”^[58]。文坛上各种嘴脸有意或无意地曲解着鲁迅，如与新月派、“第三种人”的争论等，面对这些诬陷和打击，鲁迅冷嘲：“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59]让鲁迅最为心痛的是来自同一阵营内部的误解与攻击，1930年，鲁迅加入左联，以极大的热情愿意与一切反抗社会黑暗的组织或个人并肩作战。虽被尊为领袖，但很快，鲁迅便发现自己处于被架空的状态，甚至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都对他保密，如朱正所言：“在左联主持工作的人那里，只不过是借重他的盛名罢了”^[60]，同道不仅不断对外散布鲁迅的流言，还进行公开的攻击。夏衍后来在回忆中给出相关解释：瞿秋白和冯雪峰离开上海之后，田汉、杨瀚笙相继被捕，白色恐怖严重，“左联”便和鲁迅中止了一段时间的联系，上海反共小报便乘机散布了许多挑拨“左联”和鲁迅关系的谣言，加上田汉在1934年提到胡风问题，这引起了鲁迅的极大的反感，又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61]左联的许多活动和方针政策鲁迅也存有异议，并毫不留情指出一些问题所在，这自然也加深了他与左联的矛盾。虽然鲁迅为左联作出种种努力，但左联的态度与做法使得他内心不免常常产生一种不被理解的痛楚和“独战”的悲哀。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62]既要提防国民党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迫害，反击政坛流氓的纠缠，又得小心文坛上的枪林弹雨，尤其是友军从背后射来的暗箭，鲁迅可谓腹背受敌，只得“横站”。所谓“战友”的口是心非让鲁迅一直难以释怀，深感“寒心”，正是这种感受刺激着鲁迅多次反复在文章和信件当中提到“寂寞”二字，他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蛆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63]这份心境正是因为鲁迅虽在上海多年，但依然是以“陌生人”的姿态出现，没有生下根去。可是，他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怎么生根呢？除非同他们一起腐败下去。”^[64]

作为一名主动边缘化的独立抗争者，随着病情的恶化，加上长期以来的精神焦虑与思想压力，他变得比以前更加焦躁不安，易怒多疑，甚至于那些翻译文章，鲁迅也承认：“几乎没有一篇不在焦躁中写成的”^[65]。鲁迅在对上海文化批评话语的背后，表达的是他对现代文化的担忧与思考，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晚期，不但没有丝毫妥协，斗争的意气更加强盛，如他所说，“要赶快做”^[66]。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鲁迅给自己简单算了一笔账：“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67]这种超出常态的写作速度以及狂热的战斗精神，正如夏济安所说，“他在上海的生活不乏聚众和电影作为消遣”，但却未能让使之愉悦和轻松，他“对一切假想或真实的敌人都心存戒备，他的作品更时不时透露出被迫害妄想症的征兆”^[68]。这也许就是所谓“绝望的抗战”^[69]了。深处黑暗和压迫中的鲁迅是孤独和寂寞的，这内心的孤寂感来自于他终生面对的“吾行太远”的历史脱节，但面对这份黑暗，他始终坚持着傲然站立的反抗姿态。这种境遇不仅只是鲁迅精神心理的抽象，更会投射到他的文学文本中。茅盾说，鲁迅的著作里，“没有‘人生无常’的叹息，也没有暮年的暂得宁静的歆羡与自慰，反之，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拏着刀

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70]鲁迅对上海文化的思考并不是孤立和静止的，他以决绝的批判立场，“怀着对‘中国的将来’的深沉危机感来看待上海文化”^[71]，上海作为文学文本表现的对象，凝聚着鲁迅对上海文化的独特感知，在这份感知和思考中，鲁迅把上海文化与中国文化现状相勾连，以上海为缩影，思考着整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命运和精神走向。

三

鲁迅对上海的印象还通过种种细节展现出来，他借助于日常物质意象以及民众生活相的展示，揭示隐匿于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空间的文化特性，建构其对于上海都市的印象。初到上海的鲁迅，对一切充满了新奇，“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72]。这里的住宅区，有“宽大的马路，碧绿的树，淡色的窗幔，凉风，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73]。在邻近的马路，是“三件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74]。可是不久他便发现“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糕极了”^[75]。那悠闲的住宅区，“是高等华人或无等洋人住处的门外”，而“中等华人的窟穴却是炎热的，吃食担，胡琴，麻将，留声机，垃圾桶，光着的身子和腿”^[76]。甚至邻近住宅区的那些水果店，“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77]。当鲁迅仔细打量上海的一切时，那些初来时的有趣与热闹，在他的世界中转而变为苦闷和糟糕，“住上海真难惯，不但房子像鸽子笼，而且笼子的租价也真贵，真是连吸空气也要钱”^[78]。鲁迅对上海的直观体验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他曾住过的寓所，尤其是弄堂。这个小小的公共空间成为鲁迅观察上海、想象上海的一个重要视点，表达着他对于上海的最直观的感受：“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对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79]夜幕来临时，那嘈杂的弄堂更加烦扰着鲁迅的心绪：“嚷嚷呢，自然仍旧是嚷嚷的，只要上海市民存在一日，嚷嚷是大约决不会停止的。”以至于他“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东西来”^[80]。上海势利，人情也更加凉薄，“到处都是商人气”^[81]，生病了也得小心择医，“上海的医生，我不大知道。欺人的是不少似的”^[82]；甚至一贯有合作的北新书局，也故意拖欠着稿费，“学了上海流氓中书店的坏样，对作者刻薄起来”^[83]。扰攘势利的都市气氛让身处其中的鲁迅“颇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84]。在鲁迅的笔下，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上海，高大建筑、咖啡馆、跑马场、舞厅等充斥着摩登与时尚的现代性元素完全不见，混乱和恶俗成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状态的缩影，更是整个上海镜像的投射，这样的生存状态和心理体验成就了鲁迅最初的上海想象，这样的描述不仅给人视觉上的冲击，更有情感的震撼。

“环境意象是观察者与所处环境双向作用的结果。环境存在着差异和联系，观察者借助强大的适应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所见事物进行选择、组织并赋予意义。……因此对一个特定现实的意象在不同的观察者眼中会迥然不同。”^[85]对于写作者来说，他们对上海的印象更多的来自于主体的体验与感悟，是主体心理、情绪在文本上的投射，是一种被赋予意义的上海想象，因而对上海的情感体验不同，文学上海的印象地图亦不相同。与鲁迅住在同一弄堂的茅盾虽然也认为景云里不是一个好的写作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少，笑声哭声，闹成一片”，可是转而又说：“这些嘈杂的声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这对于我，也还不妨，我是白天写作的。”^[86]在提到上海的初夏时，他甚至用了“天堂”一词来形容，“这天堂般五月的傍晚”^[87]，并且在那部大规模地描写上海都市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子夜》中，开篇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鲁迅作品中的、具有强烈现代性与都市化特征的现代上海都市生存空间，如电车、霓虹电管广告、小火轮、汽车等；而这市声的喧闹，作为“想象上海的标志性经验积淀和审美符号”^[88]的张爱玲，不仅尤其的喜欢，并且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89]；同时期生活在上海的沈从文，也曾明确地表达过自己对上海的无法抗拒性：“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别处都“似乎还不如在上海一小楼上蹲下有意思”^[90]。《上海：记忆与想象》一书中所编选的文章，涉及了20世纪上半叶上海‘气’、上海‘人’等诸多方面，大都偏重于上海的阴暗面，这些文字记忆中的上海与我们曾认识的上海竟有如此之大的差异，编后记中马逢洋认为：“这一部分与其说给出的是关于上海的‘记忆’，不如说是当时的人们对于生存之地的一类‘想象’”^[91]。但“‘想象’并不意味着虚构，而是一种对城市乃至世界的理解和把握”^[92]。鲁迅在《夜颂》中提醒我们，观察上海，要有“听夜的耳朵和夜的眼睛”，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光天化日，熙来人往”，其实“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所以鲁迅告诫人们在上海，要看到在白日那“热闹、喧嚣”所掩盖的背后，在那“高墙后门，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所“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所以，在鲁迅的上海想象中，我们看到的不是雄伟高大的

外滩建筑群，不是夜夜笙歌的百乐门，不是闪烁着霓虹魅影的舞厅，更不是传出醉人爵士乐的咖啡馆与酒吧……，而是掩藏在繁华背后的不堪，是人性的丑恶，是现代普通市民的艰难的生存方式与生命形态，是文化劣行下的生命本相。正如鲁迅所说，“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93]。在鲁迅的文学文本中，“上海”一词早已超越了一般的地理学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一个叙述场景，更是一种情绪的反映，一种心境的象征。正如王富仁所言，“在鲁迅的世界里，则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存在鲁迅心灵世界之外的事物。他所建立的整个文化的世界都是他心灵感受的世界，主体与每一个事物的关系都不仅仅是理智的认识的关系，而是包含着感受、感情、愿望和实践意义的事物。”^[94]

上海作为城市的一种，不仅是“一个独特类型的定居地，并且隐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现代意涵”^[95]。在这个“充满着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间”^[96]里，咖啡馆、电影院、公园和跑马场等，在20世纪30年代的海，早已成为作家笔下流行的固定想象。那些带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消费空间，不仅是作家们重要的聚会场所，更是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作品中重要的现代性都市标记。作为一种日常现代性生活经验，鲁迅则依然保持着他一贯的警惕性。萧红说：“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97]对于舞厅这样的公共娱乐空间，也予以拒绝，甚至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对他的一种变相的腐蚀，会减弱他斗争的心理。他说，“我过着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并不感到有趣味。因为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98]。鲁迅对上海的形象，并不是他反对或者排斥上海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而是在他的心中对上海有着另外一种想象。他既感受着现代生活，享受着上海独有的文化活力，同时又对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生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与感受，他的身上凸显着一种现代性的焦虑。如钱理群所言，鲁迅“对西洋现代文明即西方现代化道路进行深入的考察时，又发现西方现代模式也会产生新的奴役关系，并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个体精神自由”^[99]。鲁迅在上海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感的民族危机，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危机，主要来自他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危机的深深忧虑。

鲁迅言：“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诬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100]“看地底下”，这是鲁迅观察上海社会的基本视角。作为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鲁迅坚守着“真的知识阶级”^[101]的基本立场，“以平民(下等人)本位的价值观念去观察与表现上海”^[102]，揭去浮粉，露出底色，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和体验，对现代底层小市民风俗趣味以及世俗奴性进行刻画与批判，完成了对上海殖民时代众生相的刻画，这构成了鲁迅上海想象的重要层面。在上海的街头，还有一类“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揩油”者和“吃白相饭”人，“不务正业，游荡为生”^[103]，这些人地位低下，但又恃强凌弱，嚣张横行，是上海滩中的典型流氓，他们“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找寻时机“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有时也“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104]。这种流氓气甚至成为了上海的“趣味”所在，鲁迅无限感慨，上海“真是流氓世界”^[105]，除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会滋生流氓气以外，鲁迅对流氓气的批判，更多的是针对国民党专政下的流氓本质。他在《二丑艺术》《爬和撞》《帮闲法发隐》等篇中通过生动形象，批判作为“帮闲者”的二丑的投机艺术和小市民的奴隶嘴脸，人性中的奴化已经达到一种异化和可笑的状态。在《采薇》中，鲁迅批判了以小穷奇君和小丙君为代表的上海小市民趋炎附势、毫无操守的丑态征。阿金尤为代表，这个最为鲁迅讨厌的阿金是典型的上海小市侩形象，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女仆，为讨生活，眼头活络，卑躬屈膝，但同时又凌强欺弱，虚伪狡诈，俨然一个精明势利的上海小市侩。她整日里的嚷嚷，“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而“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邻近的普通洋人如果只是“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直到被那洋人“乱踢”时，“她们这才逃散”，但面对有权势的洋巡捕时，阿金的态度则完全不同，“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她“无情，也没有魄力”，姘头受人围攻向她求助时，则完全视而不顾^[106]。阿金的身上凸显了无数小市民那种自私而势利、泼辣而卑怯、人性残缺但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人生形式，这是上海镜下的人的生存方式，这些卑微的生命充斥着上海的大街小巷。

鲁迅认为在商业化的上海，“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107]。人的善良与质朴被遮蔽与掩盖，在他们的身上看到的只是私欲的横流与欲望的扩张。在物质金钱面前，人已失去了道德的底线，甚至孩子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商业化的牺牲品，“今年在上海所见，专以小孩子为对手的糖担，十有九带有赌博性了”^[108]。在上海的险恶风气中逐渐长大的少女，也渐渐懂得利用自身的条件，学着“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109]。而中国家庭教育孩子的方式无非是“打骂”和“放纵”两种方式，使其孩子或成为“暴主”、“霸王”，或为“奴才”、“傀儡”，因此，上海儿童，“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幅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

[110]。在上海这个乱哄哄的小世界中，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鲁迅更是深刻地指出：“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111]从主观情绪来说，鲁迅的内心充满了对这个所谓繁华大都市的鄙夷与不屑，生存于其间的“上海人”在鲁迅眼里更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的，女人自愿成为男人的所有品，她们“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住男子的新的一切”^[112]。上海的小市民们“感兴趣的只是今天开奖，邻右争风；眼光远大的也只不过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阔人和谁要好之类；高尚的就看什么学界琐闻，文坛消息。总之，是已将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113]。鲁迅无情地批驳底层市民世俗、奸滑、物欲劣根本质，同时，作为一种精神指向和话语形式，透露的是对上海、上海都市文化危机的深沉焦虑，鲁迅的杂文“实质上潜入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灵魂，把握了这个事件和物象所构成的世界的矛盾和张力，表现了‘现代’生活的不连续性和断裂的特点。鲁迅利用杂文这种快速‘摄影’的方法去展现现代生活矛盾的本质”^[114]。

鲁迅将生命的最后十年留给了上海，这十年间，虽然战乱频繁，“文人无文”，腹背受敌，多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但基本上有惊无险。他原本没有在上海定居下来的念头，期间也曾时时打算离开，权衡利弊之后，虽最终选择将上海作为最后的寓居之地，但这并不代表鲁迅内心对上海的欣然接受和认可，如王彬彬所说，他“从未积极主动地‘选择上海’”^[115]。他以主动“边缘化”的姿态和抵抗性立场，将上海当作中国社会的聚焦点，直指制度、规范、文化等中国社会深层症结，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叙说和想象着上海生活，表达着他的都市感觉和体验，并以不同的文学状貌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上海都市的不同侧面。与此同时，上海在某种程度上也成就了鲁迅，上海的社会文化形态、生存经验对鲁迅的写作和思考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上海不仅是鲁迅重要的人生舞台，更是他“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的整体形象完成之地”^[116]，为鲁迅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考。

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指出，“现代中国就在上海诞生”，上海，“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117]，上海作为现代中国“最复杂、最集中、最能体现现代中国社会本质与动向的城市”^[118]，“实际上充当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主体建构的最大载体”^[119]。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比任何其他城市更具有表达国家性的意义。鲁迅将上海问题国家化，以上海来表现国家意义，思考中国现代社会如何建立更合理的政治和文化体制，而上海也随之在鲁迅的文学想象中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符号。因此，考察鲁迅的“上海想象”，既可以强化以往研究中那些被忽略的因素，加深对鲁迅的研究和了解；鲁迅的“文学上海”更是深化了城市与文学关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格局。

注释：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4页。

[2]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3]郜元宝：《上海十年，造就了晚年鲁迅的辉煌》，《文汇讲堂》2016年9月22日。

[4]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

[5]杨扬：《“党治”与现代文学的应对——鲁迅二三十年代对国民党的批判》，《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

[6]鲁迅：《上海所感》，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

[7]贺仲明：《后期鲁迅(1927—1936)新论》，《文艺研究》2017年第1期。

[8]杨扬：《“党治”与现代文学的应对——鲁迅二三十年代对国民党的批判》，《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6期。

-
- [9]鲁迅：《〈三闲集〉序言》，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 [10]鲁迅：《320605致台静农》，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 [11]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 [12]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 [13]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
- [14]鲁迅：《〈守常全集〉题记》，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9页。
- [15]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
- [16]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页。
- [17]鲁迅：《又论“第三种人”》，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
- [18]鲁迅：《350106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6页。
- [19]鲁迅：《花边文学·序言》，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
- [20]鲁迅：《331114致山本初枝》，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
- [21]鲁迅：《七论“文人相轻”——一两伤》，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 [22]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 [23]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
- [24]鲁迅：《抄靶子》，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 [25]黄药眠口述：《黄药眠口述自传》，蔡彻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71页。
- [26]鲁迅：《踢》，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 [27]鲁迅：《冲》，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 [28]鲁迅：《踢》，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 [29]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
- [30]黄药眠口述：《黄药眠口述自传》，蔡彻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
- [31]鲁迅:《我谈“堕民”》,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 [32][日]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53页。
- [33]丁颖:《殖民体验与都市书写——以鲁迅上海十年的创作为中心》,《中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 [34]郁慕侠:《上海麟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5页。
- [35]鲁迅:《270919致翟永坤》,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 [36]钱理群:《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上),《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
- [37]陈旭麓:《说“海派”》,载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 [38]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4页。
- [39]鲁迅:《340409致姚克》,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 [40]鲁迅:《290523致许广平》,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 [41]梁伟峰:《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 [42]鲁迅:《271107致章廷谦》,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 [43]鲁迅:《“京派”与“海派”》,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
- [44]鲁迅:《360523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 [45]沈从文:《记胡也频》,载《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 [46]鲁迅:《商贾的批评》,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1页。
- [47]苏汶:《文人在上海》,《现代》1933年第4卷第2期。
- [48]鲁迅:《271226致章廷谦》,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 [49]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 [50]鲁迅:《290420致李霁野》,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
- [51]鲁迅:《360915致王治秋》,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9页。
- [52]鲁迅:《330708致黎烈文》,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5页。

-
- [53]鲁迅:《350209 致萧军、萧红》,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9页。
- [54]鲁迅:《340603 致杨霁云》,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 [55]鲁迅:《330711 致山本初枝》,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 [56]鲁迅:《330625 致山本初枝》,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 [57]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 [58]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
- [59]鲁迅:《360525 致时玳》,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 [60]朱正:《鲁迅的一世纪——朱正谈鲁迅》,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 [61]夏衍:《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05—206页。
- [62]鲁迅:《350912 致胡风》,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3页。
- [63]鲁迅:《341206 致萧军、萧红》,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 [64]鲁迅:《350209 致萧军、萧红》,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9页。
- [65]鲁迅:《350729 致萧军》,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
- [66]鲁迅:《死》,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3页。
- [67]鲁迅:《且介亭杂文·后记》,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
- [68]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万芷均、陈琦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 [69]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 [70]茅盾:《鲁迅论》,《小说月报》18卷11号。
- [71]梁伟峰:《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 [72]鲁迅:《271021 致廖立峨》,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 [73]鲁迅:《秋夜记游》,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 [74]鲁迅:《关于翻译(下)》,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
- [75]鲁迅:《280224 致台静农》,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 [76]鲁迅:《秋夜记游》,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
- [77]鲁迅:《关于翻译(下)》,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 [78]鲁迅:《341117 致萧军、萧红》,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 [79]鲁迅:《上海的儿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0页。
- [80]鲁迅:《弄堂古今生意谈》,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319页。
- [81]鲁迅:《290820 致李霁野》,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页。
- [82]鲁迅:《280606 致章廷谦》,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 [83]鲁迅:《290807 致韦丛芜》,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 [84]鲁迅:《331202 致郑振铎》,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8页。
- [85][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 [86]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载《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页。
- [87]茅盾:《子夜》,载《茅盾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 [88]吴俊:《“文学上海”的诞生、撕裂与消失》,《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 [89]张爱玲:《公寓生活记趣》,《天地》1943年第3期。
- [90]沈从文:《致王际真》,载《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3页。
- [91]马逢洋编:《上海:记忆与想象》,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 [92][美]爱德华·索亚:《关于后都市的六种神话》,载汪安民等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 [93]鲁迅:《华盖集续篇·小引》,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 [94]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 [95][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4页。

[96]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97]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载龚济民编《鲁迅在上海》(二),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80年版,第83页。

[98][日]增田涉:《鲁迅印象记》,林焕平编译,载禹长海编《鲁迅在上海》(三),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80年版,第92页。

[99]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6页。

[100]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101]鲁迅刚到上海,就被邀请去劳动大学作了一篇《关于知识阶级恶》的演说,在这次演说中鲁迅即表明了真的知识阶级所应坚持的基本立场,如“真的知识阶级”要敢于“不管利害”,“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要“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要“对于社会永不满意”,并要为社会的发展“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等。参见鲁迅《关于知识阶级》,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29页。

[102]钱理群:《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下),《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6期。

[103]鲁迅:《吃白相饭》,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104]鲁迅:《“揩油”》,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105]鲁迅:《360324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106]鲁迅:《阿金》,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9页。

[107]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108]鲁迅:《书籍和财色》,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109]鲁迅:《上海的少女》,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页。

[110]鲁迅:《上海的儿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0—581页。

[111]鲁迅:《上海的儿童》,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1页。

[112]鲁迅:《关于女人》,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2页。

[113]鲁迅:《祝〈涛声〉》,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页。

[114]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115]王彬彬:《鲁迅晚年情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116]郜元宝：《上海十年，造就了晚年鲁迅的辉煌》，《文汇讲堂》2016年9月22日。

[117][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118]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119]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